

李先念——

國家之首及社稷團結之象徵

顧汝德著

梁潔芬譯

一九〇九年生於湖北的李先念，以驚人的本領經歷了本世紀橫掃中國的風潮。他是一位出身寒微的人物，童年時代以木匠為生，從未接受過仿如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生的尊榮；他為人務實，投身於繁瑣的日常政務中，他在任內，曾幾次遭受嚴酷的批評。雖然，他好幾次似乎已失去政治權力，但中國政府總是認定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之所以經得起考驗，是基於身上兩種質素：首先，在他身上有優良政務人員的印記，即是：無論四周有什麼政治風暴在翻滾，他仍是在工作方面鞠躬盡瘁。其次就是他處理受託事務的本領。

他的首要資格，就是軍中優良的紀錄。在一個藉革命及戰爭而奪得政權的國家裏，這種資格異常重要。他於一九二六年參軍，跟着入黨，迅速地戰事上節節獲勝。在過去幾十年間，他身任政治委員、軍區司令及師長等要職。一九四九年前他曾在槍林彈雨中艱苦作戰，因而奠定他日後在解放軍中，備受尊敬的地位。

後來他解下戎裝而從事民政，在地方政府的層面，從頭學起。他雖然是中國中南部臨時各省政府機關的政務人員之一，但他主要的任務是在原籍省份——湖北境內，將武



李先念

漢建設成爲工業中心。直至一九五四年，北京方面才發現他的建樹超凡，因而調升他爲副國務總理，在中央行政中主理財政部。

實際上，早於五〇年代，在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領導下，他已扮演財政最高統領的角色，負責協調中央有關經濟及商業的各部門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以及接踵而來的三個荒年中，國家的經濟管理未曾陷入全面崩潰的地步，李先念居功至偉。當國家採取左派路線時，聞說他曾遭受批判。在一九五八年，他似乎緊隨周恩來，而與過份偏於理想主義的大躍進支持者疏遠。在六十年代初期，文革尚未來臨前，他公開表示向毛澤東思想效忠，因而保護了他的地位。雖然如此，他永不忘記自己有責任將經濟管理工作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縱然李氏小心防範，但總是遭紅衛兵懷疑。他受到非常猛烈的批判，以至亞爾巴尼亞領袖恩華諾沙（當時中國少數外籍友人之一）認為李先念在政治上受到幾乎非人的待遇。當時正規政府已告崩潰，周恩來就要處理日益繁多的政務，此時周總理愈發察覺到李先念之可貴。在一九六七年時，除了自己原有的財政工作外，他幾乎成爲處理外交部日常工作的人物。

當時很多名重一時的領袖（諸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之輩）都被文革的狂潮所蹂躪，而李先念却能逃過劫運，實在不簡單。還有更令人矚目的，就是在他主理下的政府部門仍能繼續保持效率甚高的服務。因爲銀行操作的基本理論爲當時的極左派所詛咒，所以當時的銀行體系的處境極爲危殆。在充滿暴力及無政府狀態下，當時的群眾理應很容易對銀行體系失信心，幸好當時的銀行移到財政部的直轄之下，因此它能較諸其他行政部門，更能安然渡過文革帶來的政治性貶黜。群眾的存款數目由人民幣七十二億增升至一百五十九億，這是他們對銀行仍具信心的證明。

物價亦異常穩定。假定一九五〇年的一般零售物價指數爲100的話，一九六六年

及一九六七年的指數祇升到134.2及132.3的位置，這表示通貨膨脹正受到大力壓抑。當一九八一年指數躍升至150.4時，李先念已不再負責經濟事務了。

公共財政也同樣表現出要保護國家利益的決心。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間，財政總預算上的赤字爲人民幣十九億元。若從日後中國的（經濟）經驗及情況去看，就可知這個較爲平衡的財政預算上的成就。單在一九七一年，財政差逆是人民幣一百七十億元，次年減到接近一百三十億元的數字，而政府却希望在今後的五年計劃內，保持財政逆差爲每年三十億的水平。

國外貿易是紅衛兵批鬥的主要對象。在文革時期因一般生產遭受破壞，對外貿易難免一落千丈。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間，對外貿易數字下降，六九年之後才開始逐漸復甦。一九六六年中國外貿的總值是一百二十七億元人民幣，在一九七六年升至二百六十四億元左右。

在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被捕後，李先念成爲推行現代化政策的主腦人物。除了由於自己在文革風暴中的顯赫政績外，李先念的權力亦因華國鋒的地位而增強。當華國鋒於一九七一年由省政府寂寂無聞的工作開始遷升至中央政府後，華氏曾一度成爲李先念的保護者。但不久，由於鄧小平及其同夥重返政壇，對那些逃過紅衛兵摧殘的人士頗感懷疑，李氏遂被擱置一旁。當時，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以及一九七八年華國鋒所推行的發展計劃亦大肆抨擊。

在這些年頭，李先念審慎地不自立門戶，只憑着自己的專門技能而確立聲譽。一九八二年，他辭去副國務總理之職，單出任黨副主席，直至該職位於一九八二年被取消爲

止。在身經百戰，加上陰雲滿佈下，他的命運似乎最後要退下來了。

但是中國的情況漸漸起了變化。自從一九七九年，李先念不再參與公共政事以後，他一向推行的政策，從此遭受嚴厲的批評。但他先前致力謀求解決的問題，亦陸續出現，最爲嚴重者莫如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失業問題等，再加上貪污舞弊、逃稅、外貿及重工業管理欠妥等。可見由一九七九年的革新所引致的自由主義及各種的試驗並非很成功；相比之下，李先念先前所有的政績，變成更顯赫了。

中國依照去年頒佈的新憲法去挑選國家主席時，李先念具備條件成爲候選人。在國家建設的主要因素中，他個人聲望最爲彪炳。李將軍備受軍隊的尊敬。這位出身寒微的革命元老，有足夠資格成爲共產黨員的典範，他從未過份地親毛或親極左派（相反，極左派却經常批評他）。他既跟從周恩來，便不跟那些把毛澤東大部份思想擯棄的「務實派」人士認同。他在黨內把持着較能容納多方意見的中間路綫。

在國家機構內，這位政務家的能幹及忠誠，無人能出其右。若有人能不顧高層領導人之間有什麼政治紛爭，仍堅持使國務機構工作繼續運行的話，這個人就是令人景仰的李先念了。還有，他多次隨代表團出國交往，以及在國內與外國政要展開艱鉅談判的經驗，使人深信他有資格代表中國處理國際事務。

在香港問題上，李先念也曾作出特別的保證。直至一九七八年止，他被視爲親身介入發展香港的人士，他致力使香港成爲北京外匯的主要來源。據報，在港方由北京創辦及經營的銀行及商業機構，全部由他監理。

在國內最高政治機構中，這位新上任的國家主席，是對香港經濟的複雜運作，及香港對中國經濟多年來的貢獻，有直接認識的少數人之一。

在紛亂交加的日子內，李先念永遠是個可靠的人物，因爲他總有辦法去盡量減低國家在政治出軌時所要付出的代價。他的角色是專心以高度專業技術來管理政事，拋棄個人的政治野心。在很多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年輕幹部較易效法的模範，這也就是在劉少奇以後，他是第一個被選任國家主席的原因之一。